

蘇軾文學論集

齊魯書社

苏轼文学论集

刘乃昌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5印张 188千字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300

书号 10206·53 定价0.80元

目 录

苏轼简述.....	1
试谈有关苏轼评价的几个问题.....	14
论苏轼同情人民的诗篇	
——兼谈古代文学作品的人民性问题.....	28
论苏轼的安边御敌思想和爱国诗篇.....	43
壮观应须好句夸	
——谈苏轼的写景抒怀诗.....	58
谈苏诗的艺术个性.....	75
东坡豪放词漫议.....	95
一曲阳关情几许	
——谈东坡写友情的词.....	121
✓试谈苏、辛词风的异同.....	133
✓横槊气概 英雄本色	
——谈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词.....	147
借婉曲缠绵之调，寄政治失意之感	
——谈苏轼的《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154
✓苏东坡的散文.....	161
苏轼的文艺观.....	176
论佛老思想对苏轼文学的影响.....	188
苏轼与欧阳修.....	202

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	217
苏轼在山东.....	233
苏轼年表.....	245

苏轼简述

一、生平与思想

苏轼，宋代多能多产、才华横溢的杰出作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在其父苏洵的熏陶下，他少年勤奋学习，母程氏还“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东坡先生墓志铭》）。

嘉祐元年（1056），苏轼二十一岁，由旱路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祐四年始由水路再度赴京。这次通过制科考试，除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大声疾呼地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及至熙宁二年（1069）苏轼还朝时，王安石正在神宗支持下雷厉风行地进行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有许多不同。如他强调察乎民心，而不赞成过于强化皇权；侧重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略》十八）；他还认为“欲

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在整个熙宁时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相机对邑政进行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未予究追。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舒亶、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讪谤朝廷”，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责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改元元祐，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也被调回京都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罢废免役法。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辨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出知杭州。不久召回，贾易等人又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祐保守气氛充满朝堂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打起“绍述”的旗号，专整元祐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

(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直到建中靖国元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不久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善于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圆通灵活地来处世应物。他少年就“奋厉有当世志”，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策别》第八)的盛世，有志于“尊主泽民”、“致君尧舜”，具有前期儒家那种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曾说：“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萎靡废放，日趋于弊”(《御试制科策》)。这表明他反对因循苟安的态度是坚决的。他主张改革，但又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存在牴牾。再加上苏轼性格耿介，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祐，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苏轼政治生活上的不幸，使他仕途坎坷，历尽升沉，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二、创作成就

苏轼把文学当作不朽的事业，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

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内容，以期“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南行前集叙》）。在文章风格上，苏轼提倡自然奔放、个性化和有独创性，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强制推行一种模式“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已经触及到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丰富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苏轼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他在诗、词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一）诗

苏诗今存二千七百多首，题材广泛，社会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苏轼在早年即感受到社会上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发出过“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忧”（《许州西湖》）的感慨。后来辗转播迁，目睹人民困苦，写了不少“悲歌为黎元”的诗篇。如在凤翔时写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描写朝廷摊派苛重徭役，给百姓造成的负担。通判杭州时的《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对百姓为餬口奔走贩盐而身陷囹圄，表示深切的同情。离密州时写的《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反映了北方农民在连年蝗旱灾害侵迫下的痛苦生活。在黄州写的《五禽言》、《鱼蛮子》，借渡河农夫和渔民一家的困苦生

活，控诉了地主剥削的残酷性。这些诗篇都写得情真言挚、朴实无华，有的还以具体描述，留下了人民悲惨遭遇的真切剪影。

苏轼同情人民还表现为对社会生产的重视和对民生问题的关切。以此，抗灾恤贫、兴利除弊、改善劳动工具和生活条件，也成为苏轼歌咏的重要题材。例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写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开发煤矿、创制工具、利用水力，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苏轼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

苏轼怀着关心民瘼的心情，主张朝廷应“节用以廉取”，反对统治者为满足个人享受和贪欲而不顾百姓死活。如在《李氏园》中，讽刺五代李茂贞“抽钱算闲口”的残酷盘剥；在《荔支叹》中，指责当朝显宦“争新买宠各出意”的丑恶表演；都是富有讽谕力量的。在针对现实的讽刺诗中，某些作品同情人民的思想同不满新法的情绪错综交织，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其中虽难免有夸大新法缺点之处，但更多地方则准确地针砭了新法的流弊，这是应当具体加以分析的。

苏轼写过不少主张抗敌御侮的爱国诗章。他对北宋日益深化的边防危机有清醒的认识，怀有建功报国、扭转积弱局面的热情。这在他诗作中时有体现。如《将官雷胜得过字代作》以轻捷跳跃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喋血边廷的常胜将军；《和子由苦寒见寄》、《祭常山回小猎》，表达了诗人跃跃欲试的报国雄心；《送子由使契丹》、为送蒋颖叔镇守西河写的《再送》，以进取的精神激励行者不辱使命和献力疆防。叙事史诗《获果庄二十韵》，记述了元祐二年种谊收复洮州、俘获西蕃首领果

庄的胜利。此诗在祝捷中建议朝廷一面力戒守将骄矜，加强边备；一面采用宽厚政策，招抚边廷部族，使他们同汉族和好相处。这些诗篇无不体现着诗人关心国事的热忱和昂扬进取的精神。

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苏轼一生足迹遍中国，饱览奇景伟观，写了大批瑰奇的写景诗。嘉祐中苏轼由水路出川时，经长江三峡，作有《江上看山》、《巫山》、《入峡》等诗，描写了蜀中的奇绝风光，可说是青年诗人的才华初露。苏轼两度任职杭州，“天教看尽浙西山”（《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写下了《游金山寺》、《望湖楼晚景》、《望海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使长江夜色、钱塘潮头、江南雷雨、西湖胜景，在苏诗中留下了幽美动人的形象。他在彭城、胶东所写的《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晚年远放岭外，更以浓厚的兴致，再现了祖国南疆风物的独特风韵。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满怀欣喜爱悦的感情体现出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如《新城道中》、《白塔铺歇马》、《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等诗，都写得生机盎然，洋溢着浓郁的泥土芳香和生活气息。尤其苏轼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如《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和陶归园田居》、《郊行步月作》等，更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及亲密的友谊。

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或表明超脱事物才能看清事物的

全貌，或喻指满意的成果有赖于主客观的统一，或指明大自然的变化并非由于神灵的主宰。这类诗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在唐诗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苏轼的独创。苏轼性格开朗，他描摹大自然的笔墨，常常饱和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如《东坡》、《慈湖夹阻风》，暗示人们不要贪恋捷径坦途，人生难免碰上巉岩逆风。《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戏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融情入景，借景写情，显现作者履险如夷、破忧为喜的开扩襟怀，表明诗人在逆境中对生活充满乐观和自信。

此外，苏轼对绘画书法等很有造诣，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以多采文笔品题了他人作品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寄托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见解，在苏诗中也是颇有特色的。

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堪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以做到“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如《泛颖》写临流照影，波闪影动，情态活现；《韩干马十四匹》写画中群马，各具神态，巧夺画功。写春夏景物：“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横道清泉知我渴”（《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写物传情，体察入微。

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如《郭祥正家醉画竹石》：“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借助想象把抽象创作冲动形象化；《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把山风陡起描摹成仙

乐合奏；《登州海市》：“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面对碧海想象到群仙的出没：都是驰骋幻想的浪漫主义名篇。苏轼长于以新颖的比喻刻划事物，如以“西子”比西湖，以“紫金蛇”比闪电，以“赴壑蛇”比年光易尽，以“飞鸿踏雪泥”比人的行踪无定，以兔走鹰落、骏马下注、断弦离柱、飞电过隙等一系列形象比徐州洪的急湍，都是有名的例子。

苏轼发展了韩愈“以文为诗”的传统，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笔力驰纵透辟，雄健非凡。如《王维吴道子画》、《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戏子由》等，或论画、或议政，文思滔滔汨汨，如潮翻泉涌，极富气势。由于苏诗中的议论成分和散文化句式多是与文学语言和澎湃激情紧密结合，因而有利于提高表现力，并不影响诗的形象性。苏轼驾驭语言的气魄很象韩愈，辞源来路很广，典故汇聚笔端，他都能反复淘洗，运用自如。当然，由于应酬赓和、矜才炫学，某些作品也偶有用典过多或粗率冗长之弊。

苏轼对古近各体均能驾取自如，但总的说来，更长于古体和七言。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不测”（《诗人玉屑》卷十七），最能体现奔放的才情，如《送李公恕赴阙》、《法惠寺横翠阁》、《送沈遼赴广南》等，都妙笔驰骋，奇气横溢。五古如《寒食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等，则写得朴厚无华，词清味腴，以自然入妙见胜。苏轼的七律也很出色，如《和子由澠池怀旧》、《初到黄州》、《汲江煎茶》等，都是气韵天成的佳篇。其格调流利圆转，略与白居易、刘禹锡诗风相近，而更为奇警妥溜。苏轼对五言近体用力较少，集中五律五绝不多，而七绝则写得精美明快，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篇。

（二）词

北宋词坛绮靡婉约之风盛极一时，苏轼异军突起，顶住传统习惯的压力，突破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今存三百四、五十首东坡词看来，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苏词扩大了社会内容。苏轼用词体尽情地写爱情、离别、旅况、友谊、农村以及政治情怀等等，打破了题材的狭窄性，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尤其值得注意的，他以劲笔健毫刻划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念奴娇》（大江东去）等篇，表现出一种横槊气概，在词史上是带有开创性的。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青年时代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贬谪后宁愿引身幽居、不肯随人俯仰的情绪；《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用祢衡的遭遇暗寓峥嵘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可以说凡能写进诗文中的生活内容，苏轼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轼任徐州知州时，巡行城外，写了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生产和生活小景，描绘了黄童、老叟、采桑姑、缫丝娘、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农村人物，为读者提供了一组洋溢着浓郁生活气息的农村风俗画。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有所创变。他以写诗那种波澜横生的气势和屈伸自如的笔力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如《八声

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映庵手批东坡词》）。《满庭芳》（三十三年，今谁存者），格力挺拔，语句遒劲。元祐词人以诗文句法入词，始于苏轼。苏轼把陶潜《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櫟括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也堪称创制。以前词家于调名外极少立题，苏轼不少词作不但始用标题，有的还系以小序，小序长者达数百字，文采斐然，颇能引人入胜。

苏词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有些作品浮想联翩，逸兴遄飞。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写作者幻想乘风登月，又不甘心天阙的清寂；《念奴娇》（凭高眺远）写诗人“翻然归去”，飞上“玉宇琼楼”的水晶宫；《满庭芳》（归去来兮）融合天孙织锦、王质遇仙的神话，虚构了自己在银河滩头巧遇织女的故事，幽默地反映了作者的坎坷处境。这类瑰奇的篇章，可以说精神上上承屈原、李白，下开辛派词人的清旷飘逸之作。

在语言和音律上，也体现了苏轼的创新精神。苏词语言多吸收诗人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以清雄见称，改变以前词人镂金错采的风尚，“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酒边词序》）。前人多指责苏词“不谐音律”，“虽工而不入腔”（《墨客挥犀》）。然当时歌手袁绉曾唱《水调歌头》中秋词，宋代词评家赞赏《水龙吟》咏杨花“音韵谐婉”、“全章妥溜”，都说明东坡词并不忽视音律。不过，苏轼更重视词的文学生命，他重视音律，但不拘泥于音律。

苏轼词风以豪放为主调，但又是多样化的。除了“大江东去”一类壮词外，也还有清旷飘逸、雄浑跌宕、空灵隽永乃至缠绵妩媚之作。有人说苏词“短于情”，是不对的。他的爱情词、婉约词，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蝶恋花》（枝上柳绵吹又少）、《浣溪沙》（道字娇讹语未成）等词，都写

得韵格婉媚、一往情深。正如《词苑丛谈》所说：“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

（三）文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分析当时的内外矛盾，针砭时弊，提出系统改革政见，体现出作者对北宋中叶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和主张奋发兴革的进取精神。《平王论》借平王东迁的史事，论证“避寇而迁都”的失策，对朝廷的怯于外敌提出了警告。《留侯论》一扫黄石公授书的神秘色彩，指出这是秦末隐士有意启迪张良，促使他在楚汉战争中执行正确的策略，见解新颖，不落窠臼。这些论文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叙事纪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能借助于生活片断和有代表性的细节显示人物性格。《潮州韩文公庙碑》有叙有议，结合韩愈一生遭遇，评述了他对文学儒学的贡献，写得议论风生、气势充沛。洪迈称：刘梦得、皇甫持正、李汉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众说尽废”（《容斋随笔》卷八）。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韩魏公醉白堂记》，或表达关心稼穡与民同乐的思想，或体现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襟怀，

或赞扬严于求己、廉于取名的风节，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思翻澜，引人入胜。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奇境森冷，耸人毛发；《记承天寺夜游》写空庭步月，夜气清爽，沁人肝脾；前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字字若画。这些游记也不单纯流连风月，而总是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家文字的影响。

书札、题记、叙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广于交游，笃于友谊，“简易疎达，表里洞然”，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答秦太虚书》、《答参寥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写了不少题记、叙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江行唱和集叙》、《书吴道子画后》、《文与可筼筻谷偃竹记》、《书蒲永升画后》等，都紧紧扣住文艺创作的特征，阐发了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其中也有不少独得之识、经验之谈。其笔记文《东坡志林》流传较广，内多随笔、杂感、琐记，不少体现性情，对晚明小品文颇有影响。

三、关于苏轼作品的编纂和注释

苏轼集生前和身后刻本丛出，多已散亡，今存通行全集为

《东坡七集》，分东坡集、后集、续集、奏议集、外制集、内制集、应诏集共一百十卷，附有缪荃孙校记，系清末端方据明成化本校印，有《四部备要》本。南宋初苏文盛行，郎晔曾拣选四百多篇，为之作注，编成《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于光宗绍熙二年表进朝廷，书中征引不少宋代资料，是今存最早的苏文注本。《四部丛刊》有影印郎注本，文学古籍社曾据以排印，并参照罗振常苏文考异，作了校订。苏词别行，南宋绍兴间即有注本。近人朱疆村有编年本《东坡乐府》三卷，今人龙榆生曾得宋傅干注东坡词残卷，因据朱本编年，撰成《东坡乐府笺》三卷，可资参考。

苏轼晚年就曾有人为苏诗作注，南宋绍兴间王十朋搜集众家诠释，撰成《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二十五卷，卷端有南宋傅藻《东坡纪年录》，有《四部丛刊》影宋本。这是今存最早分类集注本，不过该书依内容分七十八门，编排方式不够科学，南宋施元之（德初）、顾禧（景藩）曾对苏诗进行编年注释，撰为《施顾注苏诗》四十二卷，陆游作序，刊于嘉泰二年，保存不少宋代珍贵资料。清康熙间宋萃曾得残本三十卷，由邵长蘅、李必恒补注刊行。清查慎行以宋萃刻本疏于校讎，多所臆改，因重为考订，编成《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清冯应榴采查注编年，汇录各家注文，考核补正，撰成《苏文忠公诗合注》五十卷，有嘉庆时刊本。稍后，王文诰又采旧解，对苏诗作总结性的集注，编成《苏文忠公诗注集成》一百零四卷。其中还详考苏轼生平，撰为《编年总案》，并附《两宋杂缀》、《苏海识余》，所收有关材料颇为丰富。